

讀蔣南翔

• 唐少傑

文革時印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蔣南翔言論集》是蔣南翔言論的一個「珍本」，其中四十九篇文章和講話，在1998年出版的《蔣南翔文集》並未收錄；它是一個關於中國現代教育史特定經歷的「孤本」。該書的定名，是因為1967年8月「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宣布蔣南翔為全國首批可以在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

我手頭上有兩本蔣南翔（1913-88）的言論集：一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蔣南翔言論集》（以下簡稱《言論集》）；另外是《蔣南翔文集》（以下簡稱《文集》）。本文基於這兩個文本，談談我對蔣南翔的看法，即我是通過讀這兩個文本來進一步認識蔣南翔的。

一 從《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蔣南翔言論集》到《蔣南翔文集》

《言論集》的編印者為「首都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下屬的「批改辦公室」與「鐵一連」，時間為1967年11月，刻板油印，十六開本，約四十萬字。《言論集》扉頁上註明「供批判用」，收集了蔣南翔自1931年至1966年6月發表的八十篇文章和有關講話，以及「文革」初期寫成的兩篇「檢查」。這部言論集在當時印製數百冊。今天看來，它既是蔣南翔言論的一個「珍本」，因為它收集的其中四十九篇文章和講話，沒有被收錄在後來正式出

版的《蔣南翔文集》中；又是一個關於中國現代教育史特定經歷的「孤本」。之所以用了如此題目，是因為1967年8月「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宣布蔣南翔為全國首批可以在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這部文集的編纂和發行，既響應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部署，又配合了清華「文革」群眾兩派圍繞幹部問題所進行的論戰。

《文集》署名「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清華大學編」，中共中央領導人陳雲題簽書名，由國家教育委員會領導人、清華大學領導人等十四人組成的編輯組負責編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大三十二開本，上下兩冊，全書九十一萬字。據編輯者云，該文集是從蔣南翔發表在各種刊物上的文章及內部會議上較完整的講話整理稿約380多篇中篩選出的，「突出重點，去掉重複，壓縮文字，有的採用節錄，共選留了149篇文章」^①。

這部文集對蔣南翔在「文革」時期的言論只收錄了他在1969年中秋節被「監護」期間寫的一首詞和後來被「監督勞改」時的一個發言記錄稿，而沒有收錄蔣南翔在「文革」時期寫的「檢

查」、「交代」、「批判稿」、「審訊口供」等材料，這一點與《郭小川全集》^②和《聶紺弩全集》^③收集了這些方面的材料，大不相同。

《文集》與《言論集》的不同，首先在文本的價值上，後者近如「絕版」，已不可能「重印」和「再版」；而前者首版就印發了3,000冊。其次在文本的效用，後者是用於批判的，盡其可能地把當時收集到的蔣南翔文章和講話和盤托出；而前者是為了讚揚和紀念的，盡其可能地有所「甄別」和「取捨」。再者在文本內容上，後者差不多包括了蔣南翔自1931年到1966年的所有文章和部分會議講話；而前者儘管收集的時間跨度是從1934年11月至1987年12月，比後者所包括的分量要大得多，但卻做了很大篩選，留下了不可迴避的缺憾；特別是：對於蔣南翔在1957年夏季「反右派」運動的文章和講話，對於他1958年有關把清華大學建設成「共產主義大學」的許多講話，對於他1966年6月「文革」爆發前十個月裏的講話、文章，《文集》統統沒有收錄；它與1987年出版的蔣南翔的《堅持社會主義的教育方向》有所不同，即在收錄一些文章時，做了特意的刪節。

我認為，蔣南翔的文章和講話已經不僅僅屬於他本人，它們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一種不可多得的特殊資料。《文集》無法完整地展現蔣南翔的一生經歷和思想全貌，不利於人們反思和把握中國現代教育歷史的由來和發展。我衷心希望《蔣南翔全集》能早日出版，以便後人比較完整地認識和理解蔣南翔。的確，從《言論集》的編印到《文集》的出版，這與其說是蔣南翔命運的寫照，不如說是中國內地三十餘年來教育坎坷和教育變數的反映。



二 蔣南翔的「大學理念」

根據上述兩個文本，可大致概括出蔣南翔的「大學理念」有如下方面：

1、中國社會主義大學教育必須堅持和加強中共黨的領導。為此，在各大學裏，必須建立一個既懂教育又團結戰鬥的中共領導班子。這是蔣南翔「大學理念」的首要方面。這一大學理念可簡單地歸結為蔣南翔所特指的「又紅又專」，這裏的「紅」是指大學在辦學制度和辦學方向上堅持中共的政治領導。

2、對於大學生的教育要貫徹德智體全面發展和因材施教的思想。大學的根本任務就在於為國家建設培養又紅又專又健康的專門人才。蔣南翔「大學理念」的核心曾被認為是培養甚麼人、為誰服務的問題。蔣南翔十分重視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學生的政治思想上「三層樓」，即對不同的學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沿着「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個台階不斷前進。他根據當年自己的經歷，多次告誡清華「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的

中國社會主義大學教育必須堅持和加強中共黨的領導，這是蔣南翔「大學理念」的首要方面。這可簡單地歸結為「又紅又專」，「紅」是指大學在辦學制度和辦學方向上堅持中共的政治領導。蔣南翔(圖)十分重視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學生沿着「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個台階不斷前進。

蔣南翔治下的清華，大多數教授、副教授分別是在1949年前學成的和在1949年後陸續留校的年輕教師，針對這種情況，蔣南翔主張「兩種人會師」，即讓掌握較多業務知識的老教師幫助年輕黨團員教師提高業務水平，而後者又幫助前者提高思想覺悟，使兩種人都成為「又紅又專」的教師，一改1949年前清華「教授治校」辦校方針。

教師：「不要把政治理論課講成國民黨黨義。」^④他總是擔心學生有沒有興趣學習這種政治課或者學了這類課程後有沒有收穫。因此，為了加強這類課程，他親自出任清華大學哲學教研組主任，親自給大學生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給研究生講授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課程。

3、大學要尊重教育規律，堅持以教學為主，把生產引進學校，實行教學、生產和科學研究相結合。蔣南翔力圖把清華辦成這種教學、生產和科研「三結合」的基地，但在實際過程中，教學的比重經常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而生產與科研之間卻成反比的勢頭不斷上升。蔣南翔一直非常重視改進和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把學習質量的改進和提高（即「專」）當成了與「紅」並列齊舉的標準之一。儘管在很多情況下，學生一邊學習專業知識，一邊大搞政治運動（或者乾脆停課），反對成名成家，「拔白旗」，鬥「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但是，堅持所謂「又紅又專」，畢竟是與把政治標準當成大學及學生的唯一標準的做法有所不同。

4、新中國教育面臨的一個兩難困境就是既要快速發展大學教育的數量，又要提高大學教育的質量。基於中國內地多年的經驗教訓，蔣南翔反覆強調，在大學教育中，實行數量發展和質量提高相結合的原則，以提高質量為主；正確對待大學教育中的數量與質量、需要與可能的關係。他堅決反對不顧大學的辦學能力和現有條件，盲目擴大招生數量，急於使學生學成，致使大學水平下降的做法。

5、大學辦學要依靠廣大教師和職工隊伍辦學，注意發揮學者、專家的骨幹作用，尤其是教師在教學的主導地位和主導作用。當時清華大多數

教授、副教授有兩種背景：1949年前學成的和1949年後陸續留校的年輕教師，針對這種情況，蔣南翔提出「兩種人會師」的主張，即讓掌握較多業務知識的老教師幫助提高年輕黨團員教師的業務水平，而後者又幫助前者提高思想覺悟，使兩種人都成為「又紅又專」的教師。這實質上改變了1949年之前清華「教授治校」的辦校方針，也是對兩種不同類型的教師的處境的一種「協調」。這種主張無法掩蓋在很多情況下，身為黨團員的年輕教師相對主動，而有學問的年老教師相對被動的狀態。

6、重視並加強學生骨幹份子的培養工作。為了使新中國自己培養的大學生盡快走上教育部門的管理職位，蔣南翔開創了從清華高年級學生中選拔出一批諸多方面比較突出的學生，擔當低年級學生的政治輔導員，實行業務學習和思想教育「雙肩挑」（可延長一兩年畢業）的做法。到「文革」前夕，蔣南翔領導下的清華大學在十多年裏一共培養出628名這種學生型的政治輔導員，如今這些人中已走出了約四十位擔任中共中央領導以及中國省（部）級領導的幹部。蔣南翔非常重視學生培養的生動活潑的局面，在他的領導下，清華學生大致分為體育和文藝、政治兼業務、學習尖子學生三種類型。蔣南翔把學生體育代表隊和文藝社團、學生政治輔導員隊伍、因材施教的優秀學生歸結為「三支代表隊」，力求通過不同渠道培養「又紅又專」的學生。這種做法一直保持到現今。在全國所有大學中，蔣南翔50年代中期就開始在清華實行每一學生班級建立班主任教師與政治輔導員共同負責（類似於中共軍隊的軍事首長和政治首長共同負責）的體制，並延續至今。蔣南翔所建立、培養的

學生幹部負責體制，強有力地保證了他在清華的領導職權真正能做到上傳下達，令行禁止。這些學生幹部每每把所稱的「南翔指示」或「南翔精神」雷厲風行地加以貫徹、落實。

7、在學生的諸多學習環節中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鼓勵應屆畢業生到工廠或工地進行「真刀真槍」的畢業實習、畢業設計，即把在校所學的理论知識與實際的建設問題結合起來。蔣南翔曾把學生的學習比喻為到森林狩獵，教師應教會學生使用「獵槍」，而不是只給學生現成的「乾糧」；同時，學生更應重視「獵槍」即學習方法和實踐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只會啃「乾糧」即背誦現成的知識或結論。

總之，蔣南翔的「大學理念」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學教育史上佔有重要一席，至少它是在中國內地運行了十多年之久、中斷十年後依然有着影響的教育範式的縮影。雖然在「大學理念」上蔣南翔無法企及他的老校長梅貽琦(1889-1962)所倡導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三大宗旨，但是這種理念卻代表了上述十多年間中國內地大學教育的一股主流。毫無疑問，與蔣南翔相比，梅貽琦教育思想更為深遠，影響更為悠久，這主要在於後者準確體現了現代大學制度及其相關建設的真髓。蔣南翔沒有像他的老校長那樣，對甚麼是大學、甚麼是大學精神、甚麼是大學教育等一系列問題，做出明確而系統的闡述^⑤。換言之，在中國現代教育文獻寶庫中，蔣南翔沒有留下流芳後世的經典著作。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內地最近十幾年來出版的諸多關於中國二十世紀教育史的著作和關於這一世紀的教育經典選集或彙編中，沒有收入蔣南翔的相關文章或講話，也幾乎沒有提及蔣南

翔在這一世紀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這種對蔣南翔有意的迴避、明顯的忽略、無奈的沉默直至難於言表的心態，究竟說明了甚麼呢？

三 略論「蔣南翔現象」

相較於中共歷史上若干富有特定內涵並且以專門人物命名的現象，如「周揚現象」、「姚文元現象」等，「蔣南翔現象」是特指1949年至1966年間中國內地大學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其特殊蘊涵。實際上，「蔣南翔現象」決不是只局限於教育界及大學中，而是顯現出1949年後中共意識形態的運行及其特質。具體地說，這種現象是指在1949年後中國大學教育領域，以蔣南翔為代表，力圖在堅持中共政治領導的前提下，盡可能使大學教育有序地進行所特有的歷史現象。這種現象的一個特點則是：當事人的有所作為往往被教育環境的無法作為所瓦解，以及當事人後期在一系列教育舉措上所表現出的無奈和尷尬、自我矛盾和自我消解。儘管這一現象還不是所謂極「左」教育的代表，但是它認可並執行毛澤東的教育方針，並且對這一方針加以修補，進而與極「左」教育有着不可割捨的聯繫。即使如此，這種現象最後也為毛澤東所痛加斥責和拋棄。這裏，結合回顧蔣南翔在中共以及清華歷史上的若干特殊經歷和影響，力圖映現出「蔣南翔現象」的諸多方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蔣南翔在清華就讀之際，是以抗日救亡運動的學生代表走向政治歷史舞台的。1935年12月，蔣南翔飽含熱淚寫下新型救亡運動那響徹乾坤的名言「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⑥時，他所代表的「一二九」運動知識份子，則把

「蔣南翔現象」是指在1949年後中國大學教育領域，以蔣南翔為代表，力圖在堅持中共政治領導的前提下，盡可能使大學教育有序地進行所特有的歷史現象。儘管這一現象還不是所謂極「左」教育的代表，但是它認可並執行毛澤東的教育方針，與極「左」教育有着不可割捨的聯繫。即使如此，最後在文革中也為毛澤東所痛加斥責和拋棄。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文化運動的主旨再次由啟蒙改寫為救亡。這種以救亡為首要職責的知識份子依然與「五四」知識份子有着天然的歷史關聯。七年後，蔣南翔在撰文紀念「五四」運動時，念念不忘「五四」精神的真髓，寫下了許多他日後寫不出來的論述⑦：

我國自民國初年開始創立正規大學以後，在蔡元培先生的苦心創導下，就在全國大學教育中相當普遍地培植起自由研究的學術空氣。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這種自由研究自由討論的學風，對於多少世代以來蟄伏在封建枷鎖下面的我國落後的思想界和學術界，曾盡了莫大的推動作用。「五四」以來在我國思想中有着重大歷史意義的幾次大論戰，……無一不是學術自由下面的輝煌產物。假使說自辛亥革命以後我國真有甚麼值得稱道的建樹的話，那麼我國大學教育中「學術自由」的深厚傳統，應該是其中之一。這是我國教育事業上最可寶貴的精神遺產，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加以尊重。……而國民黨近年來所推行的黨化教育，提倡所謂「一個主義、一個思想」的思想統制，黨同伐異，排斥異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無異是企圖以強制的法令來「欽定」一切「真理」，不容再有任何比較討論的餘地。這對於莊嚴的學術研究工作，實是一種侮辱和殘害。

在引用了「指鹿為馬」的成語典故後，蔣南翔痛切寫道：

和這相類似的情形，現在是日甚一日的傳播到全國各大中學校裏去，這實是我國整個民族後代的隱憂！一切對於中華民族的「未來」寄存着熱望的人士，必須以最堅決的反抗，來回答

這種斷喪青年智慧，汨滅青年理性的毒害。

確切地講，早年蔣南翔是介於「一二九」運動知識份子與延安知識份子之間的典型代表。蔣南翔投身於中共青年工作後，他身上的知識份子屬性沒有泯滅，對於一些重大問題仍保持着自己的見解。在《文集》中，最有歷史價值的文章當屬他1945年3月寫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了。蔣南翔明確承認，自己所在單位大張旗鼓進行的「搶救運動」是失敗了，反覆強調在黨內鬥爭中運用群眾運動手段的殘酷和弊端，彷彿深刻預見中國未來一系列群眾運動的恐怖和缺陷。他一再指出，「搶救運動」對知識份子黨員的沉重打擊和嚴酷迫害，給「知識份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⑧。他給這一運動作出了自己的評判：「此運動所涉及的範圍是這樣寬廣，對於相當多的人，這是一段提起來就叫人傷心的血淚史。」⑨他呼籲：「從此廢止在黨內進行『普遍肅反』這種反奸鬥爭方式」，因為，「這種已在屢次實際鬥爭中證明是有害的鬥爭方式，我們實已到了應該給它做出否定的結論的時候了。」⑩儘管蔣南翔當時因這一意見書而受到批評和降職，但是這一意見書成為後人研究和評價延安「搶救運動」的一面歷史之鏡。在評論到這一意見書時，作家、蔣南翔的同學和同志韋君宜寫道⑪：

如果當時的黨中央重視並採納了這個年輕人的意見，如果不再那樣獨斷專行、惟我獨尊，如果黨內生活多一些公開化和民主化，將會避免後來的多少個傷害全國知識份子和人民群众的可怕運動啊！也許解放後的中國會更穩定一點。但是沒有！

早年蔣南翔是介於「一二九」運動知識份子與延安知識份子之間的典型代表。他投身於中共青年工作後，知識份子屬性沒有泯滅。蔣南翔指出所在單位大張旗鼓進行的「搶救運動」是失敗了，反覆強調在黨內鬥爭中運用群眾運動手段的殘酷和弊端。他說：「這是一段提起來就叫人傷心的血淚史。」當時蔣南翔因這一意見書而受到批評和降職。

蔣南翔在1953年就說過：「與其寧『左』勿右，還不如寧『右』勿左好。」^②我認為，把韋君宜的《思痛錄》^③與蔣南翔的上述意見書結合起來讀，就能比較深切地體會「搶救運動」的意義和影響了。蔣南翔在「文革」結束之後，再也沒有寫出類似於上述意見書的文章來反思和批判不知比延安「搶救運動」貽害大多少的「文革」了。值得深思的是，為甚麼在蔣南翔去世兩個月後才使得上述意見書公諸世人？

許多事例表明，蔣南翔在中共歷史上起到了鮮為人知的重要作用。例如，1938年蔣南翔把自己的清華同學、中共秘密黨員熊向暉推薦給周恩來等人，並且使熊向暉進入了國民黨西北地區最高軍事指揮官胡宗南身邊擔任機要秘書^④。1947年，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延安，蔣介石、胡宗南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其手下軍長，毛澤東等就已經先知道了這些命令^⑤。毛澤東稱讚熊向暉「頂幾個師」^⑥。又如，1941年1月蔣南翔從重慶去延安時，給同車的一位中共烈士之子李遠梵改名為李鵬，李日後成為新中國第四任總理^⑦。1952年底，蔣南翔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其原因不在於他的學術經歷，而在於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背景。

蔣南翔到清華後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加速了清華教育轉型的完成。但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本是一種方針，卻演化成一種具體操作，演化成一種不出大學問家的格局」^⑧。清華大學在過去五十年裏沒有出現大學問家，其原因不只在於清華自身。蔣南翔在清華50-60年代初裏可圈可點的經歷，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蔣南翔意識到以清華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教育發展同近現代中國與西方

的文化矛盾密切相關。他主張學習外國的教育經驗，要結合中國國情。自50年代初，清華在放棄了過去實施的美國教育模式之後，急促引進蘇聯的教育模式。許多蘇聯專家、顧問（最多時有三十三位）長駐清華，直接指導清華的各項教學工作。蔣南翔在接受蘇聯專家、顧問幫助之際，也拒絕過他們的意見，獨立自主地決定在清華創建新中國急需的工程物理學系、自動化工程學系、無線電工程學系和精密儀器工程學系等。他堅拒蘇聯專家關於把清華大學辦成「水利土木建築學院」的建議，最終沒有使清華由大學（university）降為專科學院（college）。

蔣南翔看到了以「大躍進」方式辦大學所造成的浪費和弊端，他認為應該集中力量辦好若干重點大學，把這種大學建設成「教育中心和科學研究中心」，應在這種大學中培養出第一流的人才。蔣南翔多次對清華幹部說過：「我們能否培養出林家翹這樣的科學家？培養不出，我們只好承認領導失敗。」^⑨歷史對此已做出了回答。蔣南翔當然知道，除了林家翹之外，從昔日的清華還走出了像楊振寧這樣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蔣南翔對於當時清華黨委書記、校長助理袁永熙，副校長錢偉長，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等人的冤案；對1957年571名清華師生被打成「右派」；對1958年的「教育革命」（它成為「文革」時期「教育革命」的某種預演）；對清華在招收學生和分配畢業生等方面一度奉行以「家庭成分」為主的「階級路線」（實為「血統論」）；等等，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60年代開始，蔣南翔先是擔任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後出任國家高等教育部部長，並繼續兼任清華校長和黨委書記，他力圖跟上和理解毛澤東

蔣南翔到清華後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這種方針演化成一種具體操作，演化成一種不出大學問家的格局。蔣南翔多次對清華幹部說過：「我們能否培養出林家翹這樣的科學家？培養不出，我們只好承認領導失敗。」歷史對此已做出了回答。蔣南翔當然知道，除了林家翹外，昔日的清華還走出了楊振寧這樣的諾貝爾學獎得主。

日益激進的教育主張和舉措，但實際上，他難以完全認同這些主張和舉措。例如，他認為，把群眾運動的方式搬到學校的教學工作中來的做法是不對的。1964年，第一機械工業部的一所學校提出了「毛主席語錄進課堂」，即「人人用，堂堂用，全面開花」，他對此做出了批評^②。又如，針對學習毛澤東著作庸俗化的做法，即一些學生在拉單槓、舉槓鈴等體育鍛煉活動中，大唸「毛語錄」等現象，他說：「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要搞形式主義。毛主席著作是馬列主義科學，不是白蓮教的符咒。」^③面對日益泛濫的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崇拜毛澤東個人的運動，蔣南翔提出，清華要開「萬人頂風船」，抵制這種形式主義。

為了發動「文革」而從教育界開刀，毛澤東完全贊成「文革」伊始對清華、北大領導幹部的罷免^④。不過，從蔣南翔在「文革」前十個月裏的一系列講話中可以看出，「文革」之所以首先在教育界裏成勢，則是經過「文革」前教育界不斷趨於極「左」的湧動而必然水到渠成、泛濫開來的。然而，從1966年6月5日蔣南翔對清華全校師生所做的最後一次講話中，又可看出他對於剛剛爆發的「文革」所表現出的被動處境和複雜心態。當時，面對由若干就讀清華的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子女發起的批評蔣南翔、指責清華校黨委的大字報風潮，蔣南翔很有預見地迅速制止了一些中、基層幹部提出的「反對蔣南翔校長就是反革命」、「反對清華校黨委就是反黨」的做法。不同於這些幹部根據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經驗來理解剛剛爆發的「文革」，蔣南翔深知這些幹部子女做法的資訊來源和矛頭指向。蔣南翔引火燒身式的自我批評旨在順應來勢迅猛的「文革」浪頭，並且斷言^⑤：

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運動要成為我們學校歷次政治運動中最徹底、最深入、最有威力的一次滅資興無的革命運動，要把我們清華大學建成一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化堡壘。不達目的，決不休止；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1966年6月10日，即「文革」爆發後約十天，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停止蔣南翔的職務^⑥。6月13日，進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宣布了這一決定。與此同時，蔣南翔在高等教育部連夜受到批判^⑦。蔣南翔先是被當作教育界最大的「走資派」，後被視為劉少奇、鄧小平在教育界的代理人，他在「文革」初期先後被拉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挨批鬥，有時一天被審訊、批鬥達二十七次^⑧。具有歷史諷刺的是，「文革」中廣泛使用的批鬥「走資派」的方式——「噴氣式」（即低頭彎腰，兩手用力向上高舉）一詞是蔣南翔在批評延安「搶救運動」過火做法時發明的。蔣南翔是否想到二十多年後，這一批鬥方式為甚麼不僅被他的學生「活學活用」在他的身上，而且從延安走出而遍及中國的大地？顯然，蔣南翔的倒台不是「文革」群眾所為。清華「文革」兩派論戰時有人提出，蔣南翔究竟是被上層「拋」出來的，還是由群眾「揪」出來的？這一提問本身就表明了「文革」伊始政治鬥爭的荒唐和骯髒。

無論昔日受惠於蔣南翔領導的清華大大小小幹部和學生怎樣急於同蔣南翔在政治上劃清界限，但是他們從骨子裏無法完全接受「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衝擊，也無法完全隔絕與「文革」前十七年的種種關聯，他們當中許多人實質上充當了「沒有蔣南翔的蔣南翔力量」，發揮出蔣南翔發揮不了的作用。這些人與蒯大富領導的清

從60年代開始，蔣南翔力圖跟上和理解毛澤東日益激進的教育主張和舉措，但實際上他難以完全認同。例如，針對學習毛澤東著作庸俗化的做法，即一些學生在拉單槓、舉槓鈴等體育鍛煉活動中，大唸「毛語錄」等現象，他說：「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要搞形式主義。毛主席著作是馬列主義科學，不是白蓮教的符咒。」

華激進造反派相對立的一個群眾組織迅速結合，使得「文革」進行了半年多後迅速「偏離」了它的初衷，即超越了鬥走資派的主題，並與上述造反派決一死戰，致使「文革」初期發生了轉向。蔣南翔在「文革」爆發不久就彷彿成為所謂「死老虎」，游離於鬥爭日益白熱化的群眾運動之外。

1968年5月，蔣南翔被北京衛戍區「監護」審查。1970年8月22日，在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上，毛澤東關心此時進行的「整黨」運動對一些黨員的「吐故」（即開除黨籍）問題，他認為：「對蔣南翔這樣的人留下來好。」^②因此，蔣南翔被放回清華，在汽車廠鑄工車間勞動改造。稍後，《紅旗》雜誌發表了否定「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代表作〈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一文，蔣南翔在該文旁逐條加以批注，駁斥其論點，並公開自己的觀點。他還針對清華「工宣隊」試圖把清華辦成汽車廠的做法發表意見書，指出學校應以辦學為中心，不應以辦廠為中心，清華應辦成大學而不是中專。1972年初，在清華一處顯眼的地方公布工農兵學員的學習成果，作為準備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來參觀的一種自我炫耀，而那些題目，其程度之淺，僅有初中水平。蔣南翔看後既吃驚又氣憤，感到拿着這種「成果」來炫耀，真給清華大學丟盡了臉^③。同年7月，他寫信給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自己要繼續革命的決心，還附交了來清華勞動兩年的總結。1974年9月底，蔣南翔剛被宣布「解放」的第二天，他被問及對「文革」教育革命的看法，他不同意「文革」當時做出的有關決議，即把「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稱為「封（封建主義）、資（資本主義）、修（修正主義）教育」，

不同意說「十七年」培養出來的學生與工農兵群眾相脫離。他對那種關於工農兵大學生雖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校學習兩三年就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說法，不以為然^④。無論如何，蔣南翔都是與「文革」格格不入的。

1979年初，由鄧小平提議，蔣南翔出任國家教育部部長。蔣南翔次年在總結「文革」前文化教育事業的經驗教訓時指出：1、「我國的文教建設未能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這是我國建設事業中比例失調的一個主要方面」；2、「不斷搞政治運動，衝擊了學校正常的教學工作，影響了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和又紅又專人才的培養」；3、「知識份子的政策過左」，「忽視知識份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4、「對於國家幹部需要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必要性缺乏認識，……強調『外行領導內行』，影響了一代幹部全面成長」；5、「在教育事業的發展上，追求高指標，不量力而行，造成幾次大起大落」；6、「對人類文化遺產採取虛無主義態度，只講批判，不講繼承」^⑤。這裏，他迴避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文革」前的教育與「文革」興起的內在關聯。蔣南翔沒有也不可能回答為甚麼「文革」最初能夠在像北大、清華這樣的大學裏爆發並得以成勢？為甚麼「文革」正是從他多年領導的清華大學裏得到了「文革」所依賴的群眾運動的運作和機制，得到了「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所倚重的群眾組織的角色和力量？換言之，蔣南翔沒有也不可能回答，為甚麼正是在北大、清華那裏，「文革」具有了自己的試驗場、生力軍和突破口？

由於蔣南翔在被當作「思想解放」標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中的被動表現，以及在總結過去學習蘇聯經驗和一些大學校長爭取大

1972年初，在清華一處顯眼的地方公布工農兵學員的學習成果，以向來參觀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炫耀，但那些題目僅有初中水平。蔣南翔看後既吃驚又氣憤，覺得給清華丟盡了臉。蔣不同意把「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稱為「封、資、修教育」，不同意說「十七年」培養出來的學生與工農兵群眾相脫離。無論如何，蔣南翔是與「文革」格格不入的。

蔣南翔於1980年1月數次講話中，不斷引用李敦白的事例，向青年人宣傳加強中共的領導以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知蔣南翔記得與否，1967年4月10日，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批鬥王光美的大會上，他與其他三百餘位「走資派」陪鬥者，低頭彎腰，「聆聽」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代表」李敦白的批判發言。

學自主權等問題上的消極態度，他受到有關大學校長的批評，被指責「認為教育工作沒有甚麼問題。例如，他曾在正式會議上說過，學習蘇聯是正確的，只有不學英語、改學俄文是不對的，教育質量要恢復到『十七年』那樣就很好」。他「在教育戰線上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始終按兵不動，隻字不提，教育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在這種關鍵時刻也無從談起，無法討論，當然也就談不上需要改革，這也就是多年來教育改革進展遲緩的重要歷史原因。」^⑩又如，為了批評在「思想解放」中的所謂「錯誤」傾向，蔣南翔於1980年1月數次講話中，不斷引用在中共廣播機構工作了三十四年並在這期間坐了十六年牢獄、70年代底回美國故鄉探親而又返回中國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的事例，向青年人宣傳加強中共的領導以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⑪。不知蔣南翔記得與否，1967年4月10日，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舉行聲勢浩大的批鬥王光美大會上，李敦白作為被特邀的所謂「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代表」發言，而蔣南翔與其他三百餘位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陪鬥者，低頭彎腰，「聆聽」了李敦白的批判發言。更有意味的是，李敦白90年代初回到美國定居，寫出了《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⑫一書，向中共「訣別」。日後出版的《蔣南翔文集》刪節了多處讚揚李敦白的長篇段落。這種事實的前前後後正是「蔣南翔現象」具有的一種自我矛盾的表現。

從「文革」結束後蔣南翔只當了二十六個月國家教育部長的經歷，可以證明蔣南翔對「文革」之後教育界的影響遠不及他在「文革」前的影響。1980年以來的中國教育界中，儘管還留有蔣南翔「大學理念」的某些痕迹，但是它已

無法再現其昔日的「風采」了。無疑，「蔣南翔現象」已經成為歷史遺迹。

四 幾點結論

1、在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新中國教育界的歷史上，沒有哪個教育工作者具有如同蔣南翔這樣獨特而重要的意義，他是中國現代史上政治文化與教育文化相結合的重要的個案體現，也是中國共產黨「十七年」教育模式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自1949年至今，沒有哪一位清華校長比蔣南翔對清華大學的發展更具有影響力，也沒有哪一位清華人士比蔣南翔給清華大學的命運注入了那樣濃厚而深重的個人色彩。

2、蔣南翔「大學理念」及其相關實踐的主要意義在於它們是中國內地1949年至1966年教育界的一個歷史「標尺」。這個「標尺」既透析出這一歷史時期大學教育的價值取向和功能目標，又映現出這一教育的現實窘境和歷史局限。

3、「蔣南翔現象」折射出1949年之後中國「思想—學術—教育」三者之間由於政治革命的作用和政治運動的制約而發生的相互斷裂。思想與學術沒有教育的支撐，思想與學術的各自破碎、分離和消失，教育失去思想與學術的滋潤，教育功能的偏執直至癡狂等等，致使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精神文化總體的缺陷造成了中國現今社會轉型中的諸多滯後。

4、今天人們紀念和評價蔣南翔的種種活動，既包含以不同的功利和需求來解說甚至塑造昔日蔣南翔形象的特殊意蘊，又伴有借助蔣南翔來抒發一己目的的複雜情懷。不管人們賦予蔣南翔甚麼樣的文化象徵、符號意

義或人格類型，值得注意的就是從蔣南翔那裏集中反映出了一些人的「十七年情結」。我對這一縈繞着揮之不去的矛盾心緒的「十七年情結」提出詰問：我們與「十七年」的關係意味着甚麼？我們是否要回歸到「十七年」？進而，是以「十七年」為標準來評判甚至來「校勘」我們現今的大學教育，還是以我們現今的大學教育為重心來反思乃至來變革「十七年」？

5、「十七年」、「文革」十年、「文革」後迄今的二十七年是新中國歷史的三大階段。這三者之間的內在張力必然影響着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走勢。由蔣南翔所代表的「十七年」教育歷史也必然給二十一世紀中國大學的建設帶來眾多值得汲取的教訓和值得批判的啟示。

註釋

①⑥⑦⑧⑨⑩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清華大學編：《蔣南翔文集》，上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頁52；75；160-61；197；202；202-203。

②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十一、十二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③ 聶紺弩：《聶紺弩全集》，第十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4）。

④ 方惠堅、郝維謙主編：《蔣南翔教育思想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頁139。

⑤ 參見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黃延復：《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⑪⑫⑬⑭⑮⑯ 清華大學《蔣南翔紀念文集》編輯小組編：《紀念蔣南翔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頁19；20；215；175；317；55；322-23。

⑰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⑱⑲⑳ 熊向暉：《歷史的注腳——

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頁72；122；93。

㉑ 楊泉：《延河之子——李鵬》（香港：利文出版社，1996），頁178。

㉒ 曾昭奮：〈清華園裏可讀書？〉，《讀書》，1994年第7期。

㉓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人物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第三輯，頁52。林家翹（1916-）：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應用數學家。

㉔ 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主辦：《新清華》2003年12月13日增刊，第二版，紀念蔣南翔同志誕辰九十周年專刊。

㉕ 參見毛澤東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國防大學印，1988），頁56。

㉖ 首都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批改辦公室」和「鐵一連」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蔣南翔言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印，1967），頁304。

㉗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8。

㉘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34。

㉙㉚ 蔣南翔：《堅持社會主義的教育方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頁103-104；30-46。

㉛ 朱九思：《競爭與轉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頁113。

㉜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著，林瑞唐譯：《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台北：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4）。

唐少傑 1959年生，現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著有《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及多篇文革研究論文。